

悲壮后的

温情

余雪莲 徐慧 著

邓一光小说创作风格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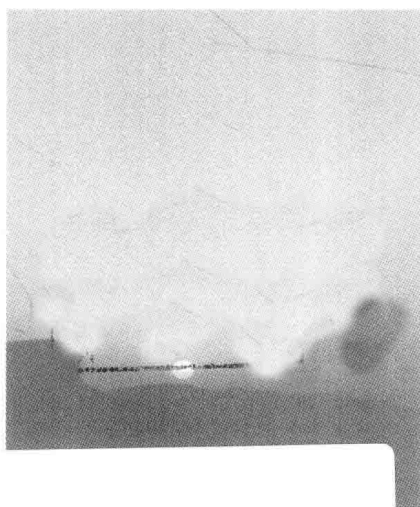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悲壮后的温情

邓一光小说创作风格的研究

余雪莲 徐慧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壮后的温情:邓一光小说创作风格的研究/余雪莲,徐慧
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5

ISBN 978-7-5426-4770-2

I. ①悲… II. ①余…②徐… III. ①邓一光—小说创作—作
品风格—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8550 号

悲壮后的温情——邓一光小说创作风格的研究

著 者 / 余雪莲 徐 慧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太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50 千字

印 张 / 5.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770-2/I·870

定 价 / 20.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前 言

邓一光是我深为敬重的作家和朋友。他的为人光风霁月、坦坦荡荡，他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样，有骨气、有血性，焕发着精神的尊严和力量。

一光被人们广为关注大概是由近二十年前的《父亲是个兵》等一系列作品开始。从那时起，一光就是特立独行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国人正经历着市场的洗礼和震荡，当很多作家沉溺地书写着世俗的日常经验的时候，一光以向往和敬重的态度回望父辈的铁血生涯，现在看，这决不仅仅是怀旧，这是一个作家对他的时代的应答，在日益拥挤、狭窄，充满交易和计算的世界中，他在想象和求证一种天高地阔的人生，一种强悍的、以血气和牺牲为价值的生命。

现在，当电视上夜夜奔腾着铁血英雄的时候，我想，认真研究这个时代精神和观念演进的学者，都会注意到邓一光当年在《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作品中的探索。他走在时代的前边，不管是有意和无意，这个作家都很早地、有力地表达了人们内心那时还无以名状的焦虑和渴望。

但一光已经走得更远，他不是一个播下种子就天天盘算收获的人，作为作家，他另有自己坚定的方向。在《我是我的神》中，我们看到，英雄走到了现在，走进了平凡生活，看到了在革命与战争中大放异彩的一种精神、一种生命力量，如何经受着我们这个时

代的考验。

我一向认为,《我是我的神》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假如一百年后,那时的人们想要了解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是怎么看待世界和自我的,他们可能会找到《步步惊心》和《后宫甄嬛传》,他们会说,这真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真是一群能够适应任何环境的人,真是一群哪怕把灵魂交给魔鬼也要达致成功的人。然后,他们也可能找到《我是我的神》,我相信,他们将因这本书而尊敬我们,他们在这里看到人怀着信念和梦想的英勇奋斗,不是为了世俗的成功,而是为了更具超越性的价值,为了成为一个在精神上光荣而尊严的人。

一光在生活中耿介崖岸,这个人常常让人感到不识时务,但他的不识时务不是由于愚钝,而是由于骄傲。他是明于世事的,实际上他远比一般人敏感多情。他的骄傲、他的不识时务,其实是对人间、对他人都怀着一份敬重,他深知人性的弱点、人生的泥泞,但他不愿意因此而贬低对方、贬低自己。这样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必定深怀痛苦,他深切地体会着泥泞,敏锐地辨析人类经验的复杂性,但是他也同时执着地怀着希望,怀着人们将在泥泞中骄傲站立的期盼。

在他近期所写的深圳人系列短篇中,英雄不再出现,人物都是平凡甚至卑微的,在琐碎的生活中经受着琐碎的喜怒哀乐,但是,所有这些作品中,总有一束光出其不意地照亮人们,那一刻,人性变得贵重而美,这些小人物,他们和一光以前笔下的英雄们一样,不是匍匐着,而是站立着。

这个系列的短篇有力地证明了一光作为艺术家的宽阔和丰沛。表现现代都市经验,对中国作家来说具有特殊的难度。我们的文学中有着令人难忘的乡土,但是,还很少有令人难忘的都市。我对一光的这一系列短篇满怀期待,我相信,几十篇合在一起,我们将看到一个非凡的都市,类似于《都柏林人》,这都市不仅有华

丽的物质宏伟的建筑，更展现着丰盛深邃的人性内容。这个都市的名字就叫深圳，我想，这是一光对他现在所在的那个城市的最美好的馈赠。

近些天来，热爱文学的人们因为诺贝尔奖而沉浸在欣喜之中。但是在欣喜之后，我们也许应该以更加郑重、更加认真负责的态度审视我们的文学。也许还有一些卓越的作家，他们还没有被我们充分阅读、认识和评价，也许他们比我们原来以为的更重要。我认为，邓一光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国文学应该自信地探索和创造，也应该自信地持续地自我勘探和发现，《邓一光文集》的出版，就是一次重新勘探、重新发现的机缘，重新勘探邓一光的作品，重新发现邓一光这个作家。

我坚信，一光还会走得更远。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李敬泽

目 录

1 前言

1 第一章 传统精神的承接(邓一光的成长背景)

2 (一) 社会家庭大背景

4 (二) 家庭熏陶与文化积淀

13 (三) 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

16 (四) 人物塑造的文化内涵

31 第二章 军旅小说转型到城市话语

31 一、从军旅小说开始初涉文坛

33 二、剖析邓一光与其他作者的军旅小说

34 (一) 其他作者的作品

36 (二) 邓一光的作品

47 三、从军旅小说创作到都市小说

47 (一) 主流的都市小说和邓一光的“非主流”

49 (二) 从军旅小说中的“英雄心”的延续

51 (三) 家庭责任感的日益增重

53 (四) 多重视角看世界

58	第三章 邓一光小说语言的特色
60	一、文化诗学：古典文学的诗意回归
64	二、“明亮的色彩”：想象、符号与真实
72	三、复调和悖论：独白与对话的张力
77	四、“伤感的颤抖”：身体政治与城市书写
85	第四章 邓一光作品的个性演绎(创作特点 1)
87	一、家族叙色彩与现实根
92	二、个人视角与英雄情结
107	三、底层叙事与现代寓言
114	第五章 生命主题、历史使命与审美品格(创作特点 2)
116	一、生命主题：尊重生命、尊重心灵
126	二、历史使命：表达现实、反思历史、思考人生
138	三、审美品格：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
143	第六章 邓一光创作的局限及创作前景分析
143	一、题材：城市写作及对深圳符号的使用
160	二、语言：翻译体与国际化书写
169	三、叙事：媒体话语与小说的互文
176	后记

第一章 传统精神的承接(邓一光的成长背景)

鲁迅先生在其《而已集·革命文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①人是生活的缔造者，而作家是作品的创作者。一个人的生长环境、成长历程对个人的性格塑造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作家的出生家庭、成长背景对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初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里，在百废待兴的艰难岁月里，在社会大变革的崎岖探索过程中，中国大地上出现并成长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人，社会环境的影响铸就了后来八十年代一些独特的文学群落。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阿城、王安忆、张炜、王朔、莫言等作家都是出生于 50 年代末期，在 80 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上的一批作家。这批作家在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创作中所发挥的力量举足轻重、不可忽视。而正当这批作家为这一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之时，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家也在用自己的文学才华对当代中国文学贡献着自己微薄的力量。邓一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让我们带着探索的目光来寻求他的成长岁月。

① 鲁迅：《鲁迅文集》，北京：京华出版社，2007 年。

（一）社会家庭大背景

邓一光，蒙古族，1958年出生于重庆市，祖籍湖北麻城。曾赴乡村插队务农，后来做过工人，当过新闻记者、文学刊物编辑。在文学小说界，邓一光可以说是属于大器晚成者。从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他尝试过各种题材和体式的写作。以小说为主，兼及诗歌、散文、影视剧本。在文学领域里默默耕耘了十多年之后，1995年以作品《父亲是个兵》声名鹊起而蜚声文坛。在这部厚积薄发之作中，邓一光把郁积已久的感情如火山喷发般倾泻出来，给文学界带来了一股强劲的阳刚之气，从而奠定了其在文坛上继续前进的基础。邓一光的创作富有崇高品质、阳刚之气、激情特征。邓一光的小说喜欢在叙述残酷的战争中把血性、刚强、雄健的英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在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呼唤英雄的回归，从而使小说蕴涵了浓郁的英雄情结。2009年邓一光从武汉移居到了深圳，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于是，《深圳在北纬22°27′—22°52′》这一作品集就诞生了，作品中的主要人群不再是城市的主导阶层，而是深圳的平民阶层，但他们却是深圳社会的主体阶层。邓一光对平民阶层的描写并没有仅仅讲述平民阶层的苦难与泪水，悲悯或同情，而是表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是《深圳在北纬22°27′—22°52′》的开篇小说，小说从写人的存在困境过渡到自然生态的困境，反映出日常问题可能涉及世界的整体。

邓一光的小说创作继承了传统的革命英雄传奇的精神，发展了革命浪漫主义情结。并在肯定自我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对战争与和平进行了新的思考。所有的这一切与邓一光的成长背景息息相关，带着这个思考我们先看看邓一光成长的社会背景。

邓一光出生于1958年，1958年是新中国政权刚刚成立的时代。民族战争和集团之间的斗争刚刚结束不久，社会满目疮痍，但是夹杂着硝烟余味的革命理想。邓一光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

社会大背景下度过的。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这是一个理想指引现实前进的年代。头顶上方飘扬的五星红旗告知当时的人们:和平与幸福是用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是来之不易的;沿着烈士的足迹完成未竟的事业是无上光荣、万众赞赏的;改变世界,扭转乾坤,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苦难人是责无旁贷的。尽管时代的变化消除了这些责任的具体性,具体的责任内容也失去了终极意义,但是,承担责任已经成为与邓一光同一时代人的自觉而不可解除的情结,终极关怀已成为这一代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这样的传统革命精神奠定了他文学创造的审美基调,这种责任感驱动了他文学创造的发展方向。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大范围的展开,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加之自然灾害造成了1959年至1962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与饥荒。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后来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央政府也指示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生活和劳动。当大部分的知识青年丢下学业,前往农村接受别样的教育时,邓一光也加入到了这样的队伍之中,赴乡下插队务农,开始和农民一起生活,体验农村的艰辛与艰苦,感受乡村的别样与平凡。然而,现实的苦难与崇高的理想顿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在理想中高昂地翘首与在现实生活中弯腰地劳作使知识青年感到十分的痛苦与茫然。曾经的满腔热情,激情澎湃地投身到社会现实中的壮志被现实反差所痛击,这在他们的心灵上划上了一道道难以愈合的伤痕。所以,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伤痕文学”的创作思潮。他们用自己的写作来控诉真诚被愚弄,天伦被破坏。他们惋惜青春被荒度,人生之残缺。当现实的残忍与理想破灭的伤痛愈演愈烈之时,人们会对现实和历史进行反思,追寻现实苦难的根源,对自己曾执着拥戴过的信

仰、理想及各种行为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与梳理。在这个相当惨痛的过程中,对自身进行否定,对自身意义进行消解,对自己血肉模糊的伤口进行全方位的清洗,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无奈地重新整理,并将之公之于众,这是何等的悲壮与伤痛!然而,现实的考验,生活的磨难,促使邓一光在人生的道路上越挫越勇,越苦难越英雄!

这样的社会成长背景,塑造了别样的邓一光,也同时影响了邓一光别致的文学创作风格。

(二) 家庭熏陶与文化积淀

1. 传承英雄主义,再造英雄形象

革命英雄传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文学创作主题、创作风格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基础与模式,对新时期的战争文学产生了不言而喻的影响。虽然邓一光的文学创作很难准确地寻找到它的根,但是不可否认作为军旅作家的邓一光,对革命先辈的红色典型进行了格外的关注,其创作对革命英雄传奇进行了有效的继承与吸收。在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军人的信仰与牺牲精神都是其创作主题,但最为明显的就是英雄主义。英雄主义往往是通过刻画许许多多栩栩若生的英雄形象来表现出来的,难以战败的英雄气质也常常是通过描摹不同性格的英雄人物而凸显出来。因此,邓一光在继承传统英雄主义的基础上,刻画了许许多多迥异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形象的诞生与邓一光的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们常常说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秦王暴政,于是有了荆轲刺秦王的永久佳话;突厥犯边,于是有了木兰代父从军的英雄事迹;三国鼎立,诸侯纷争,于是有了一位忠于蜀汉、知恩图报、义薄云天的关云长。所以这些英雄伟人的出现往往是时代与历史的产物。硝烟弥漫、枪林弹雨中英雄会愤慨的怒吼;历史动荡、生活巨变中

英雄会挺身而出,勇往直前。所以提及英勇,我们会想到战争;想到战争,我们就得回想邓一光的家庭背景与血脉追溯。

家庭孕育并培养着一个人的性格与气质,是一个人生命成长的摇篮。邓一光的强硬性格与独特气质的形成是因为邓一光有着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家庭背景:他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而且,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军人。所以,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父辈的鲜血,生命基因里先天地种下了军人的性格。父母在战火连天的之时相许,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结为伉俪,几经生死,却相濡以沫。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为邓一光的英雄塑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回想当年,中共红军在数量、力量与拥有大量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的正规军相差极为悬殊,但经过多年殊死斗争,最终问鼎天下,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甚至我们可以说,红军的每一支部队,甚至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传奇的战争经历。经历过战争中的邓一光父母,身上具有一种久经沙场的刚健豪迈与血性之威,这令邓一光钦佩乃至迷恋。所以追忆与想象父辈们的战火传奇经历,构成了邓一光小说的叙事主题,而这种叙事主旋律就是英雄主义。红色正统的家庭环境塑造邓一光的性格,影响了他的审美基调,从而形成了邓一光的早期创作理念。父母人格魅力的散发,加上有意识的教育,形成了邓一光以职业军人为基础的主要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特征表现出来的就是敬慕英雄、坚定信仰、守卫崇高、追求理想的基本价值趋向和崇尚阳刚、赞美激情的基本审美倾向。

(1) 英雄父亲

我们都知道,父亲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家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一个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血缘与伦理角色:下一代的诞生、养育、管理与守护家族成员,家族文化的维护与传承等等,都是父亲不可推卸的职责。所以,父亲一般是权威的象征,在伦理道德与文化遗产的多种话语中成为象征体。弗洛伊德、容格、拉康等许多学者都曾对这一形象与角色进行过深入的分析与

研究。拉康认为父亲是象征秩序的核心,处于文化的支配性地位,“父亲的形象作为纯粹的能指是一切约束性规则的来源和依据,对主体来说,是既定的必须无条件接受与服从的一种标志”。

在邓一光家中,父亲对其个人成长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可谓最大。父亲是一位军人,是一位经历过战火硝烟,几经生死的革命英雄。曾在革命战争中英勇不惧,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红色的江山。“高大威严从来没有笑容”的父亲形象在邓一光的脑海中尤为深刻。虽然有时候父亲严肃得令邓一光有些畏惧,但是在家中照片上的父亲是“身着军礼服,胸前佩戴着各种各样战绩勋章,腰间别着枪,威风凛凛地骑在马背上”威武令人崇敬与佩服的大英雄。父亲的照片使邓一光在同龄人中有一种作为英雄后代骄傲并自豪的优越感。于是,邓一光的成为像父亲一样的“英雄梦”在别人的赞赏与羡慕中渐渐萌发。父亲就是邓一光的骄傲,就是英雄的化身,代表着历史,象征着权威。父亲的英勇是以一种精神化的方式潜伏在邓一光的脑海里,对父亲的崇敬与仰慕是以一种放映的方式回旋在邓一光的梦想中。这使邓一光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所以,在邓一光的前期作品中,他刻画了许多如父亲般的英雄人物,用文学的形式对这样的人物进行了反复的描画和浓墨重彩的渲染,形成了一个以“父亲”为主导的英雄谱系。比如《父亲是个兵》中的邓连声、《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走出西草地》里的桂全夫与朱成元、《战将》中的赵得夫、《燕子飞时》中的沈晋东、《大妈》中的简定豪等。这些英雄形象的外貌体格粗犷而有力,胆略勇气超人而非凡,性情简单率真且桀骜不驯。他们被赋予最优秀的品质:高远的理想、忠诚的信念、坚定的意志、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心,集纳了主流意识话语中所有与“英雄”相系的正义力量和超人素质。而且,邓一光将这些传奇英雄放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将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置于枪林弹雨的凶险环境中,突显他们的血气方刚,英雄胆气与韧劲,使其成为被铁血

和炮火锻造的“武夫”与“战神”，他们强悍勇猛、拼命不怕死，爱打硬仗、身先士卒、壮怀激烈、所向披靡；他们在残酷的战场上叱咤风云、屡建奇功。

《我是太阳》中的主人公关山林少年参加红军，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艰苦卓绝的战役，几经出生入死，人生命运大起大落。然而，这使得他的英雄魅力在战场上得到了尽情地释放。作为一个典型的英雄主义旗帜的军人，关山林经历过眷恋历史、孤度光阴的低回时光，但他却依然保持着耿直忠诚、无惧挑战、永不言败的脾性，并将放马南山、刀枪入库的折磨化为英雄精神的坚守。当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使乌云变成植物人时，关山林用其生命的全部热力拼命地唤醒病床上的革命伴侣，像太阳一样重新升起。这表达了一种英雄的哲理——太阳也跌落过，可是明天还会庄严、固执地重生，继续燃烧他的生命！

然而，当革命战争结束，父亲取得胜利、成为统治者后，父亲的形象从此发生了变化。由于革命历史被高度形态化与政治化，父亲与革命历史作为意志与权力的象征引来了后来对父亲的反叛，儿辈们开始否定父亲的权威，否定上一代的历史，以一种势不两立的方式摧毁父亲的声望。整个社会不再需要权威，也不再需要崇拜英雄，形成了一种亵渎父辈的潮流。此时，邓一光对英雄主义的思考在《我是太阳》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发展。他对英雄的刻画，未像红色经典那样，在单一的英雄层面描写他们，将他们定格在戎马倥偬的辉煌年代，而是努力挖掘他们身上人性的矛盾，毫不避讳地揭露出他们身上人性的弱点以及因文化血缘而不可克服的与生俱来的狭隘、偏执与野蛮。同时，把他们的命运一再延续，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岁月。这使他们从在革命岁月叱咤风云的战神，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无用武之地的落伍者；从被万人敬仰的英雄演变到动乱时代的阶下囚，进而写出了他们作为人的

真实一面,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父亲作为英雄的前提之上:他们的跌落、失败是英雄的跌落与失败,他们落时与被弃是英雄的穷途末路,他们的缺憾是英雄的缺憾。

可是,邓一光却怀有一颗敬畏之心去发现父辈的精神本质,勇敢地搀扶起被打倒的父辈,翻检父辈的英雄历史,为父辈辩护。他的小说《我是我的神》中就刻画着这样一个父亲形象:乌力图古拉是乌力天健、乌力天时、乌力天赫、乌力天扬的父亲,经历了西南剿匪、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的硝烟年代,接受过大风大浪的洗礼。他伟岸而勇敢,实在而爽直;他敢爱也敢恨,骁勇也善战。他的传奇人生代表了永不复得的烽火岁月,他的经历折射出战火纷飞纷扰与缭乱。乌力图古拉生育的加之收养老战友的遗孤一共有七个儿女。在他英勇气质的感染与熏陶下,乌力家个个堪称英雄。他们的经历穿越了自解放全中国以来的大半个世界的峥嵘岁月,他们的身影,英雄举动与重大牺牲出现在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的战争实践和国家安全战略决策里。如当年台湾当局把“反攻大陆”叫得最响的时候,大儿子乌力天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八六”海战中英勇牺牲了。在全国上下都笼罩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紧张气氛中,乌力天时在抢挖备战坑之时被砸成了一个植物人。这看似有些荒诞,但从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说,英雄精神在他们内心里更加坚强。这说明,英雄主义精神有效地传承给了后代,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传递,而是在新的时代赋予了英雄主义新的内涵。

这种英雄主义新的内涵就是时代不同所造就的英雄也不尽相同,当乌力图古拉出现在孩子们面前并自觉地将他作为一个对象的时候,他已不再是英雄,而只是一个父亲。如果说英雄还在父亲身上延续的话,那就是乌力图古拉试图使孩子们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他不能容忍孩子们软弱无力,他甚至以武力的方式、以残酷的身体训练企图达到这一点,用他的话说就是:“你得做一个

跤王,要不你就进太平间。”他把家庭当做一个训练场:“乌力图古拉长期盘马弯弓,习惯了部落生活,他认定家庭是一个部落,不光是吃奶长大捉对繁殖的生活单元,也是呼啸原上的战斗单元。”但是这样的教育方式与乌力天赫、乌力天扬的思考完全不一样,他们不愿接受父亲对英雄的理解,认为父亲的认识还停留在战争年代的阶段。他们认为,人欺负人的现象需要打仗来解决,“只要人欺负人的事儿还有,你就得多干几年”,为和平而战。虽然乌力图古拉与乌力天赫、乌力天扬对英雄的定义不同,但重要的是,乌力图古拉在他临死的时候,认可了他的孩子们“寻找新生活”的努力。所以,在邓一光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崇父或尊父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是出于对上一代文化与精神气质的认同,这种认同赋予了英雄主义新的内涵与意义。

(2) 英雄母亲

家中除了父亲以外,另一个对邓一光影响较大的是他的母亲。自从有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母亲都是慈爱宽厚人格的化身。这样的文化思维与沉淀使得母亲的形象伟大但单一。而邓一光在其作品中所塑造的母亲是有别于传统形象的新母亲:这个新母亲和其他母亲一样,具有高贵的品格,宽厚的仁爱之心。但是在这些可贵的品格之外,这个新母亲也有一种刚烈的性格与坚毅的特质,这种独特的气质缔造了一种令人惊异的传奇形象。

邓一光的母亲是一名带有蒙古血统的蒙古族妇女。蒙古族是一个富有英雄血脉与传统的民族,蒙古族独特的草原文化魅力深深地吸引了邓一光。据说蒙古族人的基因中带有狼性的成分,这个民族在战争史上创造的英雄壮举更是空前绝后的。日本学者太田三郎认为:“观蒙古民族雄图伟业,仰俯六百年间,当时都为龙盘虎踞之大版图而赞叹。自有地球以来,英雄之席卷大陆者不知凡几;自有历史以来,君主之削平邦土者亦不知凡几。然规